

泰安城究竟从哪里来

——破解泰山脚下古城“三迁四址”的历史迷局

□孙晓明

汶河岸边，埋着泰安最早的“城市基因”

站在今天的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，谁能想到，脚下这片土地，在六千多年前就已经热闹非凡。大汶口人在这里建起了大型聚落，他们烧制陶器、磨制玉器、种植粟黍、饲养家畜，甚至有了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。考古学家从这里挖出的红陶兽形壶，至今还在博物馆里憨态可掬地望着来来往来的参观者。

但真正意义上的“城市”，却要等到春秋时期。那时候，齐国在泰山南麓建起了一座城，取名“博邑”。它的具体位置，就在今天泰山区邱家店镇的旧县村。滔滔汶河水从城边流过，巍巍徂徕山在远处守望，这座城一出生就带着不凡的气度。

博邑有多重要？《左传》里记着一笔：哀公十一年，齐国联合吴国攻打鲁国，其中一场仗就打在博邑。可见在当时，这已经是兵家必争之地。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，推行郡县制，博邑摇身一变成博阳县，还升格做了济北郡的郡治——相当于今天的省会城市。从春秋到汉武帝之前的四百多年里，这里一直是泰山南麓的政治、文化中心。

你要是那时候来博城（即博邑），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象？宽厚的城墙夯土筑成，城里有官署、有市集、有作坊，城外是阡陌纵横的农田。庶民操着齐地方言，在城门楼下讨价还价，赶着牛车运粮运草。汶河水涨了又落，城里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，谁也不知道，一场改变城市命运的大事正在酝酿。

汉武帝封禅，让一座新城横空出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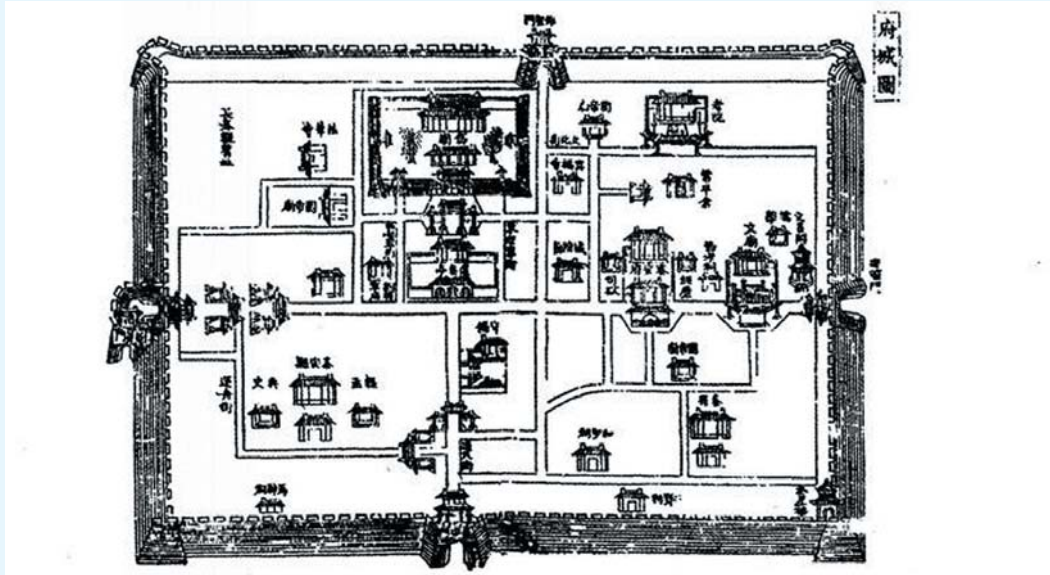
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，五十五岁的汉武帝刘彻带着满满的自信，率领千军万马来到了泰山。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，已经北逐匈奴、南平百越，觉得自己有资格跟上天汇报一下功绩。封禅大典办得热热闹闹，圆满成功之后，汉武帝一高兴，下了一道诏书：从当时的嬴县和博县各划出一块地，新设一个县，专门用来供奉泰山，取名“奉高”——奉祀高山的的意思。

这还不算完。第二年，他又把泰山郡的治所从博城迁到了奉高城。这一下，奉高城彻底取代了博城的地位，成为泰山地区的中心城市。它的位置，就在今天岱岳区范镇的故县村。

奉高城是汉武帝为封禅量身定做的“接待中心”。皇帝来泰山，总得有个像样的地方住吧？总得有个地方存放祭器、排练礼仪吧？奉高城就是干这个用的。汉武帝前后八次东封泰山，东汉光武帝、章帝、安帝也接踵而来，帝王的车辙一遍遍碾过奉高城的街道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。

三国时的“建安之杰”曹植，曾

在泰山脚下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泰安人，嘴里常念叨一句老话：“先有旧县，后有故县；故县三迁，才有泰安。”这句话像是一个代代相传的暗号，藏着这座城市的出身秘密。你若追问：泰安城到底从哪里来？是先有山，还是先有城？老人们便会眯起眼，指着汶河的方向，悠悠地说：“那可得上溯到两千多年前说起了……”



泰安府城图（选自清乾隆二十五年《泰安府志》）

写下“驱车挥弩马，东到奉高城”的诗句。他笔下的奉高城，想必是车水马龙、市井繁华。从西汉到北魏，这座城兴盛了六百多年，直到北齐天保七年（556年），泰山郡建制调整，奉高县被废止，才渐渐冷清下来。

今天再去故县村，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盛况。村北的农田里，偶尔能捡到几片绳纹陶片、几块布纹瓦，那是奉高城留在世间的最后痕迹。村里的老人会说：“这底下压着老城哩，种地都不敢深耕，怕翻出什么大物件来。”

三迁四址，一座城的“流浪”与“归家”

奉高废了，但城市的故事没完。北齐把东平郡的治所又迁回了博县城——就是旧县村那个老地方。隋唐时期，泰山登山路线从东路（今东御道）逐渐转移到中路（今红门路），离登山口更近的博城再次繁荣起来。唐高宗乾封元年（666年），皇帝与武则天共同封禅泰山，一高兴就把年号改了，叫“乾封”，顺便把博城县也改名为乾封县。这时候的县县城，还在旧县村。

但变化已经在悄悄发生。唐朝末年，泰山进香祈福的风气越来越盛，东岳庙（也就是今天的岱庙）周围人气越来越旺。朝廷在这里设了一个“岱岳镇”——“镇”在当时是军政组织，有寨墙，有驻军，有管理官员，只是还没有正式的城墙。五代时期，寨墙建起来了，岱岳镇的雏形出现了。

真正决定性的时刻，在宋开宝五年（972年）。宋太祖赵匡胤下了一道诏书：凡五岳所在地，县城不在岳庙附近的，都要迁到岳庙附近。这道诏书一下，乾封县（此时沿用唐乾封县之名）的县治，就从旧县村搬到了岱岳镇。这一年，被看作是泰安城区正式建城的起点。

但这还不是终点。宋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，宋真宗封禅泰山，把乾封县改名奉符县，又在岱岳镇西南另筑新城，作为新的奉符县城——位置就在今天市区南部的旧镇村。到了金朝，金兵攻陷奉符城，金朝扶持的刘齐政权在这里设立“泰安军”（“军”是宋代至金初的行政区划单位，略低于州），“泰安”这个名字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。金大定二年（1162年），泰安军的治所又迁回岱岳镇旧城，“始创泰安城”。金大定二十二年（1182年），泰安军升为泰安州，正式成为州一级的行政中心。

至此，泰安城终于结束了漫长的“流浪”，在泰山脚下站稳了脚跟。民间所说的“先有旧县，后有故县；故县三迁，才有泰安”。说的就是这段曲折的历史：旧县村（博城）是最早的中心，故县村（奉高城）是中间的主角，经过在北齐、隋朝、宋初时期的三次迁徙，最终落脚在今天的泰安老城区。

“故县三迁”，到底是怎么个迁法？

有人要问了：这“三迁”到底是怎么个迁法？说起来还挺绕。

第一迁，在北齐天保七年（556年）废止奉高县之后。隋朝开皇三年（583年），把位于今天岱岳区房村镇东良父村的岱山县，改名为奉高县。这时候的奉高县治，已经不在原来的故县村了。名字虽然还在，地方却换了，这叫“名移地易”。

第二迁，在隋朝开皇六年（586年）。朝廷又把设在东良父村的奉高县改回了岱山县。到了隋大业二年（606年），干脆把岱山县并入了博城县。这下连名字都没了，奉高县“名实俱亡”。

第三迁，其实不是奉高县自己搬迁，而是它并入博城县之后，博

城县经过唐宋时期的乾封县、奉符县两次改名，最终将县治迁到了岱岳镇。因为这时候的博城县（即后来的乾封、奉符）已经包含了原奉高县的地盘，所以从奉高县的角度看，这次迁移也可以看作它的一种“变身延续”。

这么绕来绕去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：泰安城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它是从汶河岸边一步步“走”到泰山脚下的。如果在地图上把这几座古城连起来，大致能画出一条路线：最早从汶河北岸的博城（旧县村）起步，向西迁到奉高城（故县村），后来治所又迁回博城，最终折向西北，在泰山南麓的岱岳镇（今泰安老城区）安家——这就是泰安城两千多年的迁徙轨迹。

庙因山而起，城因庙而兴

讲完了城的“流浪”，再来说说城与山的关系：泰山和泰安城，到底谁先谁后？答案很明确——先有山，后有庙，再有城。

泰山在那里矗立了亿万年，人类在它脚下繁衍生息了几千年。秦汉时期，人们在泰山建起了岱庙（当时叫东岳庙），专门祭祀泰山神。那时候的岱庙，孤零零地立在旷野里，周围只有稀疏的村落。唐朝以后，来泰山进香的人越来越多，岱庙周围渐渐热闹起来，这才有了岱岳镇，有了寨墙，最终在宋开宝五年（972年）有了正式的城池。

所以老话说得准：“庙因山而起，城因庙而兴。”岱庙从一开始就是这座城市的“核”，整个泰安城是围着它长出来的。现存的老城墙遗址——虎山路、青年路、财源大街东段、岱庙北街——围起来的一个长方形，面积约0.7平方公里，岱庙就占了将近四分之一。这种宗教建筑在城市里的占比，在中国古代城

市中相当罕见。

走进老城，这种感觉会更强烈。岱庙坐北朝南，正对着通天街，站在遥参亭前向北望，岱庙的城墙和门楼层层递进，一直延伸到泰山脚下。古人设计城市的时候，显然是精心考量过的：让泰山成为城市的背景，让岱庙成为城市的核心，让每一条街道都与山对话。可以说，泰安城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但它从一开始，就是一座“生长”在泰山脚下的城市。

城墙内外，两个不同的世界

老泰安城有四个城门。初名起得直白：东门叫“静封”，西门叫“望封”，南门叫“乾封”，北门叫“登封”，每一个都与封禅祭祀紧密相关。到了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皇帝觉得这些名字不够文雅，下旨改了一通：东门改“迎暄”，西门改“岳晏”，南门改“泰安”，北门改“仰圣”。

城墙以内是官府和神庙的地盘，城墙以外才是老百姓过日子的地方。到清末民国初，从西关到南关，从车站到北关，城外街区的面积早已超过了城里。尤其是西门外的大关街、灵芝街、顺河街，南门外的隍子街，北门外的傅公街，热闹程度一点儿不输城里。

1909年，津浦铁路泰安府站建成通车，车站街、菜园街（后来改叫财源街）更是火得一塌糊涂。商号一家挨一家，客棧、烟馆、酒店、书寓鳞次栉比，南来北往的客商、香客、小贩挤满了街道。那时候泰安有六百多家商号，大多开在这些新街上。老城里的官老爷们大概想不到，城墙外头的世界，已经悄悄抢走了城市的风头。

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的《泰安州志》里，有一段特别生动的描述，说的就是城外这种繁华景象：“遥参亭前四民辐辏，炉烟釜气日夜蒸沸无停期，岱城第一都会也，东隅迎暄门外环水缭绕，诗书农桑与逐末者半。南隅泰安门外为京省东西通衢，冠盖往来最称繁剧。西隅岳晏门外西自教场南抵社首，烟火数千家，大街百货杂陈，顺河一带粟蔬鱼果薪炭器物之类无不备具。北隅仰圣门外西通新街，东连铜器行，市肆鳞次。每当香客云集，铙鼓喧阗，直达红门以上，夜半灯火两行如繁星之布半天，亦岱麓之奇观也。”

读这段文字，眼前仿佛能看见那个烟火蒸腾、人声鼎沸的老泰安：遥参亭前，做买卖的、烧香的、赶集的挤成一团，锅里冒着热气，炉子里蹿着火苗，从早到晚没个消停；西门外大街上的百货摊子，从这头摆到那头，顺河街上卖菜的、卖鱼的、卖水果的、卖柴火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；北门外新街和铜器行的铺子一个挨一个，叮叮当当的打铜声能传出二里地；等到香客多的季节，入夜之后从红门往上，两行灯火像星星一样撒满山路，那景象，真是泰山脚下独一份的奇观。